

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 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

李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一、考察概述

筆者於2010年春天參加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舉辦的綜合考察，從5月13日至17日，共計五天，相繼穿越了江蘇鎮江、揚州和南京三市。是次活動的考察區域位於長江兩岸，從丘陵、山地迤邐至平原、湖沼地區，地形地貌豐富，橫越幾個地域文化帶，文化多樣性明顯，是本所的經典考察路線。除了參加人數眾多，考察內容的綜合性也是一大特點。因此，如何觀察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參與人員之調查行為和問題意識，如何結合不同的調查視角來看待完整的區域歷史地理變遷狀況，都需要著力學習。¹ 由於準備倉促，且限於個人能力和興趣，僅將本報告的重點放在與個人研究方向密切相關的個案上，希望藉此討論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的結合途徑。

二、汪時鴻撰《重修平山堂記》的發現與分析

大明寺位於揚州城區西北郊蜀岡風景區之中峰，初建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故稱「大明寺」。唐天寶年間，大明寺律學高僧鑒真大師即在此地籌劃東渡日本。此後寺名多有變化，清代

因諱「大明」二字，一度沿稱「棲靈寺」，乾隆皇帝巡遊揚州時，御筆題書「敕題法淨寺」。咸豐三年（1853），法淨寺毀於太平軍與清軍之兵燹，於同治九年（1870）由鹽運使方浚頤重建。1980年，重新使用舊稱「大明寺」。平山堂位於大明寺內，由時任揚州太守的歐陽修始建於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坐在此堂上，江南諸山歷歷在目，似與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平山堂於咸同年間因戰亂而毀於兵火之中，同治年間重建。

筆者在5月14日進入大明寺參觀時，爲了尋找乾隆御賜的碑銘而脫離隊伍，闖入平山堂西側的一片山水園林。園林中有一個湖，遊魚數尾，波光粼粼，風景秀美，遂在湖邊盤桓良久。偶然間注意到靠近平山堂一側的湖邊不遠處立有一塊石碑，碑題爲《重修平山堂記》，碑身高大宏偉，碑文略有殘損。匆匆閱讀一番，發現撰者署名爲「旌德汪時鴻」，頓時引起了極大興趣。因汪時鴻編修的《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²，在筆者的學位論文中被廣爲引用。爲下文分析方便，先將碑文移錄如下：

重修平山堂記

登平山遙望江南諸山，回視一平山培塿耳。自八百餘年前，歐陽公守揚州築斯室始，而平山堂號稱名勝滿天下，非八百餘年來長名勝不銷歇也。揚州繁盛沖達之區，天下無事，則士夫耽風雅，樂嘉賓，日觴詠於其間，以及舟車往來，爭攬名勝。一旦有事，必被兵，則以名勝爲用武之地，至變而蕪穢荊榛，甚至變而丘墟。灰燼毀之者屢屢，亦興而復之屢屢。前人既書，不一書已。不在識遠，但識於近。即如辛亥近今三五年中，事尚幸不至泰甚，然而蕪穢丘墟，均在不免。平山堂名勝兩字，幾於道路間緘口不譚，遊人之蹤跡亦幾於絕。山僧愀然皇皇然，力圖所以興復，而遲之久未果。日者大歡喜而來，合十謂老人曰：平山堂落成有日，敢請爲文以紀之。老人詫甚，詢所以，則以平山堂既復舊觀對，且以平山堂內外處處盡復舊觀對。費何出？則出大檀越運使公之功德，並諸檀越之功德，亦其功德也。因言新歲某日，運使公躡平山之巔，憩茲堂良久，俯仰陳跡，慨歎歎歎。僧人捧帙以時進，陳述歷來興復之所由。運使公曰：噫嘻，有是哉！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之鹽務何若，此時之鹽務何

若。無已勉蠲微簿，以俟來者。且願大奚以償，毋寧得尺得寸，不定多寡，可乎？未幾共集得捐銀一千四百元，銅錢二百千文。爰亟檄委興工，就款估計，毋使溢，毋稍靡，毋或緩值中和，節經如訖，清□月杪落成，為時不過三閱月，舉凡堂宇、祠廡、樓閣、園亭，□【以】迄□□、禪寮，靡不修潔華好，一新耳目。自後遊人絡繹，文酒高會，顧而樂之，備□佛家所謂皆大歡喜，非耶？老人因之有感矣。昔浙人金公為揚州守，重建平山堂落成，遷江甯驛傳道以去。今越使公亦浙人，適重修平山堂落成，量移東粵。不知今之視昔，同不同，為何如？又考志載，昔平山堂淪為浮屠殿宇者十□稔，金公乃從汪舍人之請以重建。今運使公蒞平山堂，□【從】僧人之請以重修，而假手於不文之老人汪某紀其事，不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同不同，又為何如？他日運使公由東粵重回首，知萬松蒼翠茫望，定不減於楊柳春風。而吾家桃花潭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抑今日者山僧此舉，迥異曠昔浮屠氏之所為，殆釋而近於儒者，其□【視】名教亦與有功焉。可紀也，□□裁就，會運使公以重修平山堂記見屬，即伸紙濡墨繕寫，以上並署名一一於紙尾。運使公謂誰，海甯姚公煜文敷也。董是役者誰，穎上陳君壽仁樂山也。文記之者誰，七六老人旌德汪時鴻次翁也。書石者誰，江都王景琦蓉湘也。山僧其誰，則法淨寺住持肇林皎如者。不可以不記。歲次旃蒙單閼之塞餘月。揚州□雲龍鐫字

注：文字不清楚者用「□」表示，【】內為筆者推測文字。

首先需判斷此碑記的寫作時間。篇尾是「單闕之塞餘月」，其中「餘月」即農曆四月，「單闕」是歲陰名，乃是卯年的別稱。《爾雅》〈釋天〉稱：「（太歲）在卯曰單闕。」³《史記》〈天官書〉載：「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⁴碑記中「即如辛亥近今三五年中」一句，提示其寫作時間貼近民國初年。汪時鴻所編家譜中有「今為宣統辛亥三年，其子時鴻七十二歲」⁵的記載，可見他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根據該碑末署名「七六老人」的年齡來推斷，碑記寫作時間可以鎖定為乙卯年（1915）農曆四月。此後的遊客便可瞻仰此碑勝跡，如在1926年李根源撰寫的《揚州遊記》就有所提示：「《重修平山堂記》，旌德汪時鴻撰。」⁶

碑中出現的幾位重要人物，事蹟是可考的，也大致反映出汪時鴻的交際圈。對大明寺有重建之功的「運使公」，乃是清末民初官員姚煜（1868-?），字文敷、文甫，浙江海寧人。姚煜於清末先後擔任奉天蓋平知縣、鹽運使、南洋學監等職。民國時期，他於1913年9月擔任兩淮鹽運使，1915年5月去職，此後相繼擔任金陵關監督及江海關監督等職。工於書法，在擔任兩淮鹽運使期間重修了大明寺，為寺中門題篆書「棲靈遺址」四字。負責為《重修平山堂記》書

法的王景琦，乃是揚州近代楷書大家。王景琦（1878-1960），字容庵，號蓉湘，揚州江都縣仙女廟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舉人。他以知縣身份分發廣東，民國後歸里，曾為江蘇省議員及省文史館館員，是揚州當地著名的鄉紳。

在這篇碑記中，汪時鴻記載了數位人士行善的過程，他們為修復平山堂籌集得「捐銀一千四百元、銅錢二百千文」，並在短短三個月內順利完工。從碑文中可見，他所關注的是揚州一地之興衰，並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中予以觀察，把揚州城市變遷的歷程概括為「灰燼毀之者屢屢，亦興而復之屢屢」，可謂精煉之至。揚州自古即是繁盛沖達之區，但因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的影響，如果天下無事，「則士夫耽風雅，樂嘉賓，日觴詠於其間，以及舟車往來，爭攬名勝」；若逢天下變亂之世，江淮之間屬南北要衝，「則以名勝為用武之地，至變而蕪穢荆榛，甚至變而丘墟」，揚州必遭兵燹而衰。有清一代，揚州因鹽務、運河而趨向繁華，但清後期以降，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堵塞，以及兩淮鹽業的相繼衰落，對於揚州而言是致命的打擊。正如捐修平山堂的姚煜所言：「有是或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之鹽務何若，此時之鹽務何若。」清末民初鼎革之際，揚州雖然未遭兵燹，但仍有亂兵。在

當年九月，汪時鴻為避兵難而逃到泰州，⁷ 整座城市的頹敗之勢已難阻擋。曾經是名勝之地的平山堂，在汪時鴻眼中，「事尚幸不至泰甚，然而蕪穢丘墟，均在不免」，個中緣由，自不待言。平山堂慘澹的景象，儼然可以視作觀察揚州城市的一個視窗。雖然無法看到汪時鴻作記時的平山堂，但透過1930年代平山堂荒草叢生的蕭瑟照片，或可為我們的聯想作一憑據。相形之下，當時的法淨寺（即大明寺）尚且顯得壯麗。

三、汪時鴻家族與揚州

汪時鴻所屬的汪三暉堂，出自甯國府旌德縣板橋汪氏一族。據《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記

載，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時期由徽州歙縣的黃墩遷往旌德，最終定居新建村。⁸ 第70世汪璿入贅江村，是為遷江村始祖。在明代後期，江村汪氏第76世汪伯瑛及汪伯珍兩兄弟遷往板橋，是為板橋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隨葬新水亭，汪伯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於蓮塘墜，汪伯瑛、汪伯珍兩人及其後代的葬址大都位於上述地點。⁹ 發展至清代中期，汪氏已經成為旌德西鄉的大族，獲得了地方大族的認可，「吾旌西鄉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恒無二姓，以汪、呂、江、王、譚數姓為最著世，世聯婚姻」，¹⁰ 結成了穩定的地緣婚姻圈。其簡略世系見下表：

板橋汪氏世系簡表¹¹

世系	74 世	75 世	76 世	77 世
祖先姓名小傳（附妻子、墓地）	汪宅興配江氏催男，墓鳳形，繼娶芮氏，同墓鄭八坦	汪永通葬新水亭。	汪伯瑛 遷板橋，葬新水亭。	汪時昌 一名昌，例受八品冠帶，天啓間延請鄉飲大賓，見邑志，娶芮氏，同葬新水亭。
		汪永聰娶江氏，同葬江村心北山園。	汪伯珍 遷板橋，配江氏招弟，墓鳳形，娶任氏，同葬蓮塘墜。	汪時桂 葬陳塘沖，娶舒氏，葬蓮塘墜。
				汪時槐 墓蓮塘墜，娶呂氏，墓羅村，又周氏，墓陳塘沖。
				汪時楷 娶芮氏，同葬陳塘沖。
		汪伯琦 葬蓮塘墜，娶芮氏，葬北山園。	汪時柏 娶譚氏，又呂氏、呂氏、江氏，同葬東山降。	

汪時鴻的父親汪承翰，生於乾隆四十年（1775），卒於咸豐四年（1854），年輕時在揚州府屬的泰州某布莊當學徒，後開辦「承茂布號所」，在通倉橋北置廠房屯積穀，以至於被人稱為「八房三省堂擁貲有數十萬之厚」。汪承翰的長兄汪承澤，也在當地開了兩個布號，獲利亦豐厚。¹² 汪時鴻之祖籍雖係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揚州活動，按照碑記中的說法：「而吾家桃花潭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

太平天國戰亂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從家鄉出逃至揚州府避難。咸豐十一年（1861）的夏秋之際，汪時鴻全家一時四散，其長兄汪時培奉其大伯母「竄入甯國山裏，繞建平、東壩、溧陽，

由江南偷渡江北，適乾淨土之泰州，長、次兩嫂各挈一嬰孩與俱來，幸無恙」。¹³ 徽州商編路程《標船規戒》中有〈徽州府至揚州陸路圖〉：

徽州府 六十里至 績溪縣 七十里至 主嶺 九十里至 甯國縣 四十里至 塘泥嶺 五十里至 張沖嶺 六十里至 建平縣 三十里至 梅渚鎮 用良【銀】二錢五分，雇舡至鎮江府。九十里至 溧陽縣 九十里至 金壇【壇】縣 九十里至 七里橋 此橋下出，七里至 丹陽縣 三十五里至 新豐鎮 三十五里至 丹徒鎮 十五里至 鎮江府 用元錢廿文，雇船過江，勿答

【搭】船。十八里至瓜洲鎮用元錢州文，雇小船進揚州。四十里至揚州府出曬白布、暑襪、手巾、履鞋、麻窩，東水關買。¹⁴

由此可知，汪時培一行所走的路線大致如斯。這段路程偏離水道和陸路交通幹道，走向係沿著山脈和分水嶺，行程雖然辛苦，卻是一條逃亡的捷徑。此後大量族人相繼赴揚州府投奔，給汪時鴻一家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羣萃於斯，年深月累，遂不支」，布號先後易主，只有承茂號店還在勉強維持。後來布業衰歇，全家搬至揚州，「專以館穀為家計」，生活上陷入困境。¹⁵汪氏族人多經營布業，其中也有參與經營典當業的。¹⁶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即是如此，先是「習賈於高郵之臨澤鎮為典業」，之後又調江都縣仙女鎮「改業揚州城市之衣莊」，此後到南陵縣學習典業。由於汪時鴻「以客為家，久僑寓揚州」，為方便照應，遂謀調回揚州左衛街的典當鋪。¹⁷

雖然從揚州到旌德的路程頗為艱苦，汪氏家人仍堅持將靈柩運回鄉土。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自揚州攜母親和妹妹的棺槨歸里，其詳細行程如下：

計從揚子江而大江，而蕪湖內河，而涇縣灘河、籬河，以達旌德之三溪河，既覆水又重山，夫然後抵我板橋故里。筮期在冬月，河流已淺涸，須預籌歸母柩。母有少女瑤玲，已及笄，在室亡，權葬海陵十餘年。堯孫其奉祀猶子，先於八月遷小姑柩來揚，遂於九月廿六日同移柩上宣船。宣船者，我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長江入內河至灘河，再由灘河前行，則非竹籬不可，俗謂之籬河。行籬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從此登陸，山路崎嶇，雖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數十里，以見長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難也……時在初冬十月，於涇鄉籬河中與僕子玉祥，霜天露宿沙灘七八夜。¹⁸

這段路程耗費近20天，路途可謂艱險至極，

漂江過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間露宿灘頭。而在此前，汪時鴻還千里迢迢返鄉數次，花費不少心血，預先將妻子的墓修得頗為壯麗。他在傳記中細微地描繪了對家鄉風景的感受：「從揚州來者，頗似睹隋堤煙景，而木橋，而水碓，而遠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輞川圖畫中。」¹⁹專門將風景與揚州做了對比，顯得直觀而親切，也折射出汪時鴻對兩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與揚州

與徽州府毗鄰的甯國府，明清以來逐漸形成了甯國商人這一羣體，與徽商一同構成皖南地區外出經商的主體。甯國商人出自甯國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涇縣、旌德及太平三個縣，它們靠近徽州北緣，與徽州地理環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來亦發展出一定規模的經商風氣。但作為徽州的鄰居，來自甯國府的商人羣體也被徽商的輝煌業績所掩蓋，以至於後人在盤點「中國十大商幫」時，並沒有為之單列一個位置。當前學界對甯國商人和「徽甯商幫」的宏觀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相關領域的微觀研究卻寥寥無幾。²⁰

明代中後期以降，甯國府南部丘陵山地開始出現一定規模的經商行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長、生態壓力和徽商交通線、商業文化輻射等因素的疊加，商業化氣息表現得尤為明顯。早在康熙年間，甯國知府佟賦偉就稱：

惟旌地狹人多，田土硯確，物產無幾，故富者商而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居積通易，以致富厚。²¹

在他看來，旌德外出經商的風氣之所以非常突出，應該與生態壓力密切相關。旌德在甯國府各縣中自然條件最差，人口壓力最大，這是本地經商風氣濃厚的地域背景。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及湖廣等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蘇北主要集中在揚州及泰州兩地。在揚州多子街（即今甘泉路東段及附近），有旌德江氏開設的天瑞堂藥肆。²²旌德江秋元的堂

侄江某，原在揚州當學徒，「向習成衣，寄寓揚州，咸豐初為賊擄去，日久得官」²³。與商人活動息息相關的旌德會館，主要分佈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揚州有兩座旌德會館，分別位於彌陀巷南頭和埂子街願生寺，後者一直得以保留至今，並列入《揚州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²⁴ 商人對會館的捐輸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僑寓揚州的朱德澍，「捐款修旌德會館於京師，蓋施捨不吝，見義勇為，天性然也」²⁵。

太平天國戰亂對旌德商人的衝擊很大。戰爭初期，太平軍直搗南京，很多人從蘇南戰區撤回家鄉。太平軍進佔皖南後，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及江北。旌德商人的應對方式至少有兩種類型，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這是鄉土居民的本能反應，但居民面臨長期頻繁逃亡和被各種勢力敲詐勒索「打秋風」的危險，商人與紳富大多難以生存。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經商的親族鄉人，於是揚州、六安、漢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難地。

在這其中，因緣際會，使揚州成為許多旌德逃難者的目的地。咸同戰亂以來，旌德朱德沛一家則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鎮遇太平軍，夫人遇難身亡，朱德沛隻身一人逃至揚州屬地仙女鎮，後又遷居揚州。²⁶ 在《續纂揚州府志》的人物傳記中，收錄客居揚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中；該志所載戰時殉難流寓者中，就有來自旌德

縣的江洪作、劉某、劉泮元、任錦祥及呂長祥等五人，以及相鄰的太平縣胡宏才一人。²⁷ 戰爭一結束，揚州商業立刻又活躍起來。朱則誠同治六年（1867）到揚州貿遷，發跡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將商業拓展到廬州府，「筦合肥義和衣典業，兼管安慶、亳州、舒城、全椒、巢縣、五河等分肆十餘所，每歲出入數逾百萬」。²⁸ 由此可見，揚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動地。

五、小結

筆者根據文獻資料推測，旌德商人在揚州的活動比較廣泛，但一直沒有找到較為深入的個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銘的產業汪氏小苑雖然保留至今，似未看到與該家族相關的文獻材料。²⁹ 汪時鴻所撰《重修平山堂記》，客觀上反映了旌德旅揚士紳對民國初年揚州風貌的認知。作為外地客商的后裔，他在碑記中重點談到揚州一地之興衰，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中予以觀察，體現了對於揚州經濟、文化的認同和關切之情。結合他所編撰的家譜文獻，可以構擬出汪時鴻及其家族在揚州的活動空間。綜而述之，此次考察所見的碑刻資料，有助於細化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文獻材料與田野資料之間的關聯。

註釋：

¹ 關於次野外考察的總結見周尙意等著，《人文地理學野外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尤其是頁130-131、225-227。
² 汪時鴻纂修，《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民國十六年〔1927〕鉛印本。
³ 《史記》，〈天官書〉。
⁴ 《爾雅》，〈釋天〉。
⁵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祖德世系補述·歷代傳略〉，〈皇考府君述略〉，頁20a。
⁶ 李根源，〈揚州遊記〉，載馬家鼎，《揚州文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頁197。

⁷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泰州東北鄉下水溝謁大伯母江太安人墓記〉，頁46a。
⁸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祖德世系補述·歷代傳略〉，〈五十二世祖漸公〉，頁4b。
⁹ 新水亭、蓮塘墜皆為板橋附近的小地名。
¹⁰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祖德世系補述·歷代傳略〉，〈今自皇曾祖推本所生上溯我皇曾祖府君行略〉。
¹¹ 汪錦雲等主修，《汪氏義門世譜》（乾隆三十六年〔1771〕木活字本），卷19下，〈江村板橋派·陳莊元櫻支〉，頁27a-b。

- 12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祖德世系補述·歷代傳略〉，〈皇祖府君行略〉。
- 13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泰州東北鄉下水溝謁大伯母江太安人墓記〉，頁46a。
- 14 轉引自王振忠，《新安江流域交通、商業與社會的綜合性研究——以新發現的徽州商編路程〈標船規戒〉為例》，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歷史地理研究（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137。
- 15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繼室尤夫人傳〉，頁40a。
- 16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元室王夫人傳〉，頁37a。
- 17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歷代傳略·記爾玲事始末（侄贊勳附）〉，頁56b-57a。
- 18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記爾玲事始末（侄贊勳附）〉，頁52a-56a。
- 19 民國《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不分卷），〈蘭塘永宅續記〉，頁52a。
- 20 代表性著作有戴玉，《甯國商人初探》（南京：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董家魁，《清代甯國府商業與商人研究》（安徽：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李甜，《「徽甯商幫」初探》，載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編，《亞洲：文化交流與價值闡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207-217。
- 21 佟賦偉，〈二樓紀略〉（康熙間刻本），卷3，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子部第1176冊。
- 22 李斗，《揚州畫舫錄》（嘉慶間自然齋刻、同治間印本），卷9，〈小秦淮錄〉。
- 23 江志伊，《旌川雜誌》，民國間抄本。
- 24 揚州市政府，〈揚州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http://www.yangzhou.gov.cn/attach/File/2008-10-20/08102003.doc>）。
- 25 朱家穆等輯纂，《旌陽鳳山朱氏宗譜》（民國八年〔1919〕木活字本），〈旌川朱氏族譜序〉，卷末，〈德澍公傳〉，頁12a。
- 26 民國《旌陽鳳山朱氏宗譜》，卷末，〈德沛公傳〉，頁11a。
- 27 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70），卷15，〈人物·流寓〉。
- 28 民國《旌陽鳳山朱氏宗譜》，卷末，〈則誠行略〉，頁8a。
- 29 封雷，〈揚州汪氏小苑〉，《江蘇地方志》，2002年，第6期。